

贾平凹《秦腔》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叙事比较

鲁 莉,郝明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福克纳在小说的叙事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使小说的创作进入全新阶段,对小说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贾平凹在 20 多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磨练自己的叙事技巧。同时,他能以谦虚的态度不断吸取前人的叙事经验。二者在叙事上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福克纳始终坚持乡土叙事,精心营造着“约克纳帕塔法”这个独特的乡土世界;而贾平凹在去乡和还乡之间游走,其故事文本始终关注乡土世界的芸芸众生。二者尽管在叙事视点不同,但他们始终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情冷暖,体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键词:贾平凹;福克纳;《秦腔》;《喧哗与骚动》;叙事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1-0081-04

A Narrative Comparison between Jia Pingwa's *Qin Opera* and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LU Li, HAO Ming-xing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Faulkner's daring innovation in fictional narration brought his creation into a new phase and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ctions. Jia Pingwa, in his over twenty years' literary journey, keeps on bringing forth the new writing techniques and polishing his narrative skills by adopting others' useful experience in narration. The two writers have show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narration: Faulkner insists on writing about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of Yoknapatawpha, a uniquely—created world with a certain purpose; and Jia Pingwa's writings range from rural life to urban life, with his concern about the cosmos of country life.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two always keep an eye on the underprivileged, showing their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Jia Pingwa; Faulkner; *Qing Opera*;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arration

作为 20 世纪美国文坛泰斗,福克纳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曾坦言其创造的“马孔多”小镇的灵感是来自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而在国内,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世界”、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到贾平凹的“商州”无不与“约克纳帕塔法”有相似之处。贾平凹从不掩饰福克纳对他的影响,姑且不论这种影响是仅局限于人格魅力还是包括创作技巧。《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描绘贾平凹的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J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鲁 莉(1972-),女,陕西安康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跨文化交际。

书房时,这样写道“他(贾平凹)喜欢的作家多了,比如鲁迅、林语堂、博尔赫斯、福克纳,原来想挂上几十张(画像),好比小学生的教室似的。可惜一直寻不着福克纳的画像。”福克纳一生醉心于营建“约克纳帕塔法”,贾平凹的笔触则游走在“商州”与城市之间。借助于各自对于其故乡的记忆,那片土地上世代绵延的传说,以及大胆的、甚至表面上看来荒诞的想象,他们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领域内建构起独特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家园早已超越其时空的局限,在各自的国度,甚至更大的范围内找到了情感的共鸣。

一、叙事视点的异:游走城乡与坚守乡土;叙事焦点的同:关注底层与扭曲变形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一个古老、封闭、落后的地方。“商州一直是我的根据地,或许我已经神化了它,但它是我想象和创作之本”^[1]。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贾平凹说:“我20岁以前,从农村走过来的,确实是很憎恨农村的那种生活,原来贫困的日子,农村那种现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又很留恋,对故乡又恨又爱的。就是这种复杂感情……在这部小说里,我想完整描述20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2]。从这段话中,可以读出贾平凹的乡土情结是多么深厚。出于作家悲天悯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及一个农民儿子的朴素情怀,他选择了用文学的方式演义转型时期中国广阔的农村天地所发生的故事。

贾平凹曾感叹:“我虽然写农村,但是我总是在写城市人记忆中的农村人”^[2]。他身居“废都”,却将视野投向遥远的大山之间的陕南乡村,那里现代文明、堕落与传统道德、愚昧杂陈并置,他以他的文字描摹、见证这块土地文化与精神的命脉,他试图通过叙述表现这片土地上人的原生态的生活。他的感叹或许源于其创作题材由城市向农村的回归。从早期的对商州牧歌式的描绘与歌颂到对西京,一个废都的堕落的描摹,这期间他倍受诟病。《废都》最终得以解禁,但作家却已将笔触从城市抽回,再次回归农村题材。到

《秦腔》创作结束,贾平凹经历了“农村—城市—农村”的模式变化。迄今为止,《秦腔》是其创作中赞誉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福克纳曾在访谈中提到:“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这块地虽然打开的是别人的财源,我自己至少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吧”^{[3]274}。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在《袖珍本福克纳选集》序言中首先提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名称,他将福克纳已经出版的17本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评析,并高度评价福克纳“完成了我们时代还没有别的先例的精神劳动”^{[3]22}。可见,福克纳叙述的焦点始终在“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在这块方寸天地之间,他用一生的努力来践行作家的责任。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独标一格、卓然成家,无论是从人物数量、时间跨度的角度,还是从作品主题、艺术技巧的角度,都堪称史诗性作品。其对地理环境的虚构,可以和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媲美。其描写之精细、视野之广阔,又足以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比肩。

贾平凹在乡村与城市间游走,而福克纳终生坚守“约克纳帕塔法”。单纯就乡土叙事本身而言,他们都是在方寸天地之间,以写实兼写意的方式将围绕着人的故事呈现给读者,或思考,或纪念,或鞭挞,“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4]。

纵观二者关于各自作品及故乡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在创作上与海德格尔的论断何其相似,“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5]。他们的笔触始终围绕执著追求希望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底层小人物(夏天智与凯蒂),关注那些无法把握自我命运并麻木接受外在力量改变的悲悯残疾人(引生与班吉),他们勇敢地正视残酷的社会,并将苦难的人生百态图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这的确不是想象与视觉的盛宴,但却发人深省。他们笔下的人物或麻木、或恹恹地活着;在苦难的重压下,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忙于应对永

无止境的人生难题,忙于蝇营狗苟、追名夺利,无暇顾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命题。这或许就是“生命之轻”的无奈。“正像一个极端可以随时转化成另一个极端,到达了极点的轻变成了可怕的轻之重”^{[6]172}。生命之轻最后演变成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身负重荷的“棣花街”与“约克纳帕塔法”的人们,不知不觉地滑向了黑暗的渊薮。

“将正常的世界扭曲给人看,实际上是一种荒诞。有些东西在扭曲、变形的情况下往往比正常状态下看的更清楚、透彻,更逼迫真实,也更有力量”^[7]。贾平凹和福克纳正是将不合情理的情节,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情节使用一种细致而真实的幻觉写出来,让人感到进入了一个虽然不合情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在他们笔下苦难的乡土世界中,读者看到一种神奇的、黑色的美。“美是当人不再有希望的时候最后可能得到的胜利。艺术中的美就是从未被说过的东西突然闪耀出的光芒。这一照亮伟大小说的光芒,时间是无法使它黯淡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总是被人遗忘,小说家的发现,不管多么古老,永远也不会停止使我们感到震撼”^{[6]167}。或许基于这个意义,我们才得以读懂二位作家那晦暗的乡土苦难,才得以发掘出其小说真正的价值。

二、叙事手法比较:反逻辑的生活本色还原与时空倒置的侧面展现

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独特的多声现象。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事物和文意世界。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穿插的文体、人物语言——这都只不过是杂语借以进入小说的一些基本布局结构统一体”^[8]。巴赫金把长篇小说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多语体”和“多声部”现象,即小说话语是彼此不同的叙述语言组合的体系,而不是单一叙述主体的话语。“多声部”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让人们重新审视生活本身,从中

发现可供叙事的素材。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小说叙述话语及其所呈现出的存在世界是一个多维的话语、结构形态。首先,叙述主体已完全摆脱了种种可能的观念、理念的预设,远离了以往小说的“社会——历史”结构形态,即不是从历史结构中去观察和描述日常生活并形成具有现实感的叙事形式,而是尽力写出生活的本色和原生态质地;又避免对人物个性或典型性的过分强调而造成人物与存在世界的分裂。这种叙事方式并不是浓墨重彩地刻画矛盾制造悬念,而是细腻舒缓地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不厌其烦的对话。

小说的结构就是生活的一种存在结构,它所提供的人物、情景、绵延不绝的生活进程,可以让读者去体会、感悟生活的构成,领会生活更大的可能性。贾平凹用“反逻辑”叙述,对既往文学、写作观念进行彻底的颠覆。芜杂的生活秩序正是生活与存在的本质,因为生活的秩序和形态不是某个作家、某个机构、某种势力所规定的,而所谓的“逻辑”则是人对现象的主观梳理、强制性限定。那么,决定小说结构的叙述话语就绝不是一种独立的声音,而小说话语或小说智慧则在于呈现由不同的社会杂语构成的混沌的、多元的、对话的形态,以及非个人的内在的非统一性的多声现象。这种多维、多元的话语结构造就了小说看似芜杂的、多层次的、流动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贾平凹试图把握乡村、时代、人性及精神文化宿命的途径和方法。尽管我们不会从《秦腔》的叙述中直接体味到作家“悲悯”、“激愤”的伤怀与喟叹,但生活中让人倍感纠结的无奈与苦痛隐藏在文字的背后,如同一种“元语言”在读者的内心不断回响,散发出勃勃生机。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颠覆了平铺直叙的传统叙事模式,其艺术风格的创新一直为人所称道。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作品价值观的重新构建,进而开拓了完全自由的叙事方法。他打破了僵化的苏联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叙事模式(要有时间跨度和重大情节,从事件的开头一直写到结尾,重点刻画人物的突出形象和典型意义,脱离了这些,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用实际

作品告诉人们文学作品根本没有任何统一的价值观,它的唯一作用,就是你想说的、写你想写的,你自己认为有价值就够了。福克纳通过其他人物对主人公的看法与回忆,塑造出更为饱满和立体的人物形象。他相信:“间接叙述能更加饱含激情;最高明的办法,莫若表现树枝的姿态与阴影,而让心灵去创造那棵树。”^[9]作品从四个不同的侧面,展现出凯蒂的“姿态与阴影”,并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来“创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主人公形象。从叙事角度看,小说时空倒置,寓意深刻。全书四部分的叙述时间分别为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1928年4月8日。不仅如此,人物在内心独白中不断陷入回忆,而且回忆中还有回忆,班吉部分中由现在返回过去的时空切换大约有100次,昆丁部分大约有200次。时序的颠倒有着深刻的象征含义。书中的人物觉得时间是一种与人为敌的力量,他们始终在与时间搏斗,这种搏斗体现了康普生家族无力抗拒历史进程的悲剧。福克纳对时间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南方文化的“回忆”特质,即对现实的失望、以及从昔日旧梦中觅得安慰的期望。此外,作品吸引读者去寻找叙述线索、重建时间顺序,客观上也促进了读者主动阅读、增强了作品的审美韵味。

三、结 语

贾平凹的《秦腔》叙事更多的体现出的是悲

观或绝望,如果说文学的功能分成两类:对作者本人的“安魂”和对读者的“醒世”,那么《秦腔》更是完成了“安魂”的功能。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刚刚起步,但其对传统农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动摇已随处可见。身居城市的我们吃着麦当劳,看着好莱坞大片,乘坐高速交通工具穿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同时高呼保护农村地区要保持传统的生活模式,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这堪称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我决心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并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10]。贾平凹没有最终给出农村“城市化”走向拯救文化抑或传统文明衰微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是他要在今后作品中尝试要做的,或许是他将永不触及的话题。但毕竟在《秦腔》中我们没有看到,虽然我们期待,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里程上为棣花街立起的“一块碑子”并为之欣慰。

表面上,福克纳像贾平凹一样,以家乡为“素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但福克纳与贾平凹不同之处在于其“能守在家乡的同时又能处理带普遍意义的问题”^[11]。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魁首,福克纳已用其身后的作品及其间传递的精神使其超越了南方,超越了美国,超越了时代,永远属于全人类。贾平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要实现的不是数代中国人纠结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而是真正意义的“乡土回归”与“醒世”。

参 考 文 献

- [1]贾平凹. 商州初录[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68.
- [2]近访贾平凹:回到商州[N/OL]. 南方周末,2004-05-14[2013-10-03].
- [3]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4]本雅明. 本雅明文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5.
- [5]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安居[M]. 郜元宝,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3.
- [6]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7]橙子. 朱山坡:从不同视角观察新乡土[N]. 南宁日报,2006-06-16.
- [8]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0-41.
- [9]李文俊. 〈喧嚣与骚动〉译余断想[J]. 读书,1985(3):72-74.
- [10]贾平凹. 秦腔·后记[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63.
- [11]李文俊. 喧哗与骚动[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5.